

#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徐 坚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彰显鲜明中国特色，即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倡导涵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理论自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洞察得出的重要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体现出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以新型全球化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 中

\* 徐坚，外交学院院长、研究员（北京 10003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体现了 21 世纪的时代精神，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 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基于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深刻分析和判断，强调中国外交要突出自己的特色，而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看，习近平强调外交工作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价值理念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提出，中国外交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sup>②</sup>并把这一条放在体现中国特色各类因素的首要位置。习近平用这条核心价值昭告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底色。保持这种底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治使命，也是中国的核心政治利益。

二是从人类解放事业出发，为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顶层设计方案，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其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

<sup>①</sup>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43 页。

<sup>②</sup> 同上。

的世界”，<sup>①</sup> 涵盖国际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际版’，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层面的延伸”，而且“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sup>②</sup>

三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前途联系起来，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sup>③</sup>

以上三点可以概括为维护中国发展道路，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经验智慧。这三点价值取向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外交思想特色鲜明的价值导向，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从历史哲学高度解答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向哪里去，深刻阐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为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为国际体系变革与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受到与会人士的交口称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治理改革中最活跃的动力，正成为国际体系变革中最具建设力的因素。2017年以来，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多项决议首次纳入

---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sup>②</sup> 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49页。

<sup>③</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11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性共识。<sup>①</sup>与此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近年来也不断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士的诋毁和攻击。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等政要以及学界一些人士在不同场合频频鼓吹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如“中国地缘扩张论”、“中国统治世界野心论”、“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中国仿照苏联“谋求建立红色帝国论”，中国“修正和破坏当今世界秩序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发展模式论”，等等。美国政要对中国的攻击不限于外交，许多辱华言论直接针对中国内政，大肆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抨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中美纷争界定为“文明冲突”甚至“种族冲突”。<sup>②</sup>

美国有关势力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攻击表明，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是严峻的，不仅涉及经贸摩擦和地缘政治竞争，更体现出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性质。中美博弈令世界关注，许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又难以避免中美博弈对自身带来的压力与窘困。全世界都在谈论中美是否会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新冷战陷阱”。应该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必然产物，因为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担心其霸权受到挑战。因此，虽然中国一再表明自身无意取代美国的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与攻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反映了美国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曲解和误解。通观美国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受对华认识传统偏见、双方交流沟通不到位以及中美双方新闻、舆论和宣传上存在偏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美国乃至西方大多数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因而其相关解读也就必然是扭曲的和误导性的。鉴于这种情况，从深层次上认识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对于把握中国内政外交的精髓，分析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尤其是中美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国际影响，判断世界发

<sup>①</sup> 参见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39、53—55页。

<sup>②</sup> 美国国务院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称中国是美国第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展大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深刻的理论 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①</sup>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又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点对于认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与内在逻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十分重视理论创新。他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sup>②</sup>习近平特别强调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认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sup>③</sup>对于国际事务，习近平特别重视从历史规律和长远趋势出发去看问题：“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察”，“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sup>④</sup>习近平外交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上奋力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提高中

---

<sup>①</sup>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4页。

<sup>②</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sup>③</sup>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2页。

<sup>④</sup>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第442页。

国驾驭复杂外部环境的思想境界与实践能力。

将维护中国发展道路、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经验智慧这三点最具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贯穿融通于一体，有一条基于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和“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思辨精神与理论创新成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道路的智慧和经验，同构建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各种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两种价值取向。习近平外交思想将上述看似不相容的价值理念融为一体而又保持理论和逻辑上的自洽，依靠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的深刻洞察。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产生和运动规律，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即“两个必然”的思想。“两个必然”思想揭示的历史趋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至今都没有过时。然而，如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其他趋势一样，“两个必然”所揭示的历史趋势在演进和发展中不是直线运动，而是一个曲折的长期过程。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意识到了这种曲折性，并开始纠正他们最初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在欧洲爆发、资本主义灭亡为期不远的过于乐观的判断。马克思指出：“总的来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sup>①</sup> 基于这种分析和认识，马克思在 1859 年 1 月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81 页。



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①</sup>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灭亡进程在认识上的深化。它和“两个必然”思想一起，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马克思去世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证明了“两个必然”没有过时，也证明了“两个决不会”的正确性。

19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历史变化，“两个必然”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一直在持续演进，只是“两个必然”的实现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种种转换。这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始终没有过时。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在马克思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当时最引人注目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并不是来源于作者们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的工厂童工或仅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矿山童工们的真实生活。”<sup>②</sup> 皮凯蒂所说的状况与恩格斯1845年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反映的情况相吻合。这种吻合说明，为什么恩格斯在该书初版序言中敢于“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sup>③</sup> “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推动了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迫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19世纪七十年代后，“两个必然”的实现形式第一次出现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转换，即资本主义开始通过各种改良措施缓解此前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皮凯蒂说：“今天我们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最后30多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

---

<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页。

<sup>②</sup>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页。

<sup>③</sup>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著上升。”<sup>①</sup>这一情况可以从恩格斯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得到佐证：“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sup>②</sup>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改良措施进一步由资本家层面向国家和政府层面扩展，表现为各类调节不同阶层收入分配的社会保障措施和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进一步缓解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同时也扩充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空间和潜力，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使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迥异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两个必然”实现方式的另一种转换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首先在俄国和中国等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开启，而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最初预料的那样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所做的分析和毛泽东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对于认识“两个必然”趋势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和中国的不同表现形式，至今依然很有价值。不论是资本主义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改良措施，还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开启，本质上都反映了“两个必然”历史趋势的影响和作用，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方式。

同样，“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也为历史发展所证明。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能力。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sup>③</sup>显然，此时恩格斯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及其影响。在

---

<sup>①</sup>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8页。

<sup>②</sup>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68页。

<sup>③</sup>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0页。



在他看来，股份公司对于改变私人生产和无计划性具有重大意义，而这对于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影响非同小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没变，但发展模式普遍出现了重大调整与转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转变为追求和平的国家”。<sup>①</sup> 通过调整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战后世界出现了西方引领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迎来了一个“辉煌 30 年”（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则是西方经济的又一轮繁荣期。上述情况意味着，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远未发挥穷尽。

然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所证明，并不表明“两个必然”过时了，更不能用来证明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sup>②</sup>。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地看明这些问题。一方面，苏联的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意味着僵化的苏联发展模式的失败。苏联解体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等国家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在 19 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悲观预言至今没有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失了。恰好相反，这种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制约，正以新的方式显现出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反映出，西方国家二战后的种种改良措施虽然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两极分化问题。相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再度加剧。“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在美国，其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sup>③</sup> 据美联储统计，1989 年以来，

---

<sup>①</sup> 刘江永：《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与时代特征》，《清华国家战略研究报告》，2019 年第 4 期，第 3 页。

<sup>②</sup>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孟凡礼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sup>③</sup>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16 页。

美国人口中 1% 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增加了 21 万亿美元，而占人口半数的中下层收入群体的净财富总和起来却下降了 9000 亿美元。据美国有关经济学家测算，美国 400 位顶级富豪占有的财富超过该国 1.5 亿中下层成年人占有的全部财富，而这些人构成了美国中下层收入群体的 60%。<sup>①</sup> 西方社会也开始重新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皮凯蒂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分析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步递减（这将遏制资本积累）……或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sup>②</sup> 皮凯蒂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预料到 19 世纪后 1/3 时期出现的一些可以平衡私人资本积累进程的因素，如工人阶级购买力的显著提升、技术的持久进步、生产率的稳定增长等，但“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 21 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 19 世纪的影响”。<sup>③</sup> 贫富分化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和西方国家的种种发展困境，同时在西亚、北非、拉美也加剧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已成为当今一个突出的全球性问题。而从本质上说，这一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必然”在新世纪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显示其历史必然性。这是有待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解答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从全球政治经济百年变迁的规律和走向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几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一是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共存。在当代，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后重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远未穷尽。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两种社会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共存是历史趋势。至于这种趋势会延续多久，是几代人、十几代人还是几十代人，目前无法预测，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④</sup>

---

<sup>①</sup> Scott Reeves, “Wealth Tax Debate Rages Ahead of US Election”, *China Daily*, December 3, 2019, p. 2.

<sup>②</sup>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10 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 11 页。

<sup>④</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 9 页。

二是和平共处将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长期共存的不二选择。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曾经发生过激烈对抗，相互之间发生过多场局部战争，经历了长期冷战，结果是谁也不能以暴力方式消灭对方。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消失了，但在中国和亚洲却日益壮大。实践证明，对抗和冲突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并非不可避免，相反，“近百年的历史证明，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冲突，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也可能成为战略伙伴。”<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世界主要大国掌握的巨大战略威慑能力，使大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失去其作为政治延续的传统意义。

三是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与和平共处，客观上有利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在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上开展良性竞争与相互借鉴。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模式上并非水火不容，相互之间的借鉴早就开始了。自从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那时起，“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共产主义的幽灵”先是使欧洲的一切旧势力联合起来“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sup>②</sup> 然后从 19 世纪最后 30 年开始，迫使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改良措施向工人阶级让步。进入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改良，其结果是二战后在一大批西方国家催生了福利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已不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而成为二者都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奉市场哲学，双方相互借鉴的空间和潜力日趋扩大。

四是未来百年甚至更长时期，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有可能通过内部变革与调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否通过自身改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强调暴力革命的时代，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常会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离经叛道。然而进入 21 世纪，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却在日益显现并变得越来越成熟。当今时代，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相处、在竞争中相互借鉴，都已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

① 刘江永：《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与时代特征》，第 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99 页。

大趋势，对于任何坚信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历史规律的人来说，和平过渡就理当成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途径或者说主要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会认为这种观点是天方夜谭，因为谁也无法预测这一天何时到来，但对坚信“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思想揭示的历史规律的人来说，这个结论不仅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已经开始得到客观形势发展的进一步证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围绕其自身种种发展难题和制度困境陷入内耗与争吵，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化是核心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新一轮深层次制度与政策转型初见端倪，即调整分配不再局限于二次分配措施，而是开始考虑从一次分配入手，如放弃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次分配改革比二次分配改革更加深刻，这类改革一旦成为趋势，从长期看焉知不是向社会主义方向的一种转变。

习近平外交思想将两种看似互不相容的价值取向融为一体，其内在逻辑与理论基础就在于此。换句话说，习近平在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倡导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上述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命题。既然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良性竞争已成大趋势，通过和平过渡方式实现“两个必然”的历史条件也就日趋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种价值取向可以并行不悖，也就不足为奇了。基于同样的逻辑，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也就可以被视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良性竞争的一项内容。

破解上述命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理论创新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sup>①</sup> 习近平强调理论创新，缘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因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sup>②</sup> 在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品格时，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

---

<sup>①</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sup>②</sup>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08 页。

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sup>①</sup>

###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sup>②</sup> 习近平外交思想第三个突出特征，正是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增添的鲜活时代精神。

其一，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高扬的时代旋律。认识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是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士诋毁攻击中国的一个重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他们专注于斗争、企图统治全世界。”<sup>③</sup> 他的话前半句说对了，后半句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与理想信念的误读与歪曲。中国共产党从不隐讳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代表着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也特别注重从哲学高度强调斗争精神，中共十九大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但这种斗争精神指的是勇于有效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解决矛盾的奋斗精神，而不是“专注于斗争、企图统治全世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的继承和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sup>①</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sup>②</sup> 马克思：《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121 页。

<sup>③</sup> Michael R. Pompeo, “The China Challenge”, New York, Hudson Institute’s Herman Kahn Award Gala, October 31, 2019.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地进行自我更新的思想体系，也反映在其时代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上。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发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一度认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但1848年革命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逐步调整有关判断。列宁1916年撰写《帝国主义论》时曾提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sup>①</sup> 后世不少人认为，列宁的上述判断不准，因为此后历经百年，帝国主义仍然“垂而不死”。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列宁撰写这篇著作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悉数参战，世界卷入战争的人口数以亿计。战争直接导致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覆灭，战争结束时皇冠洒落一地，英法等战胜国也是元气大伤，特别重要的是，这次战争直接催生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认为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称“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sup>②</sup> 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彻底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都进一步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立得住的。列宁当然不可能预见到二战后资本主义改良的力度和效果。应该说，列宁的时代观从提出到20世纪60年代，大约经受住了近半个世纪的考验。

列宁的时代观曾经长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事业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独立判断世界大势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继承和发展。所谓继承，体现在坚持运用时代观来分析世界形势上，因为时代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国际政治特有的一个范畴和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判断国际形势特有的一种方式；所谓发展，体现在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新内涵，对中国外交工作重心的转变意义

---

<sup>①</sup>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686页。

<sup>②</sup>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重大。根据新的时代观，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主题，虽然一个都没有解决，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发展问题及南北问题是世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此，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转向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有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时代观不仅没有改变，而且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有了进一步的升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等新理念、新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升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说，习近平外交思想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设计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统一起来，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和平共存的预期有机统一起来，在实践上，则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开展良性竞争与相互借鉴创造了更大空间，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同舟共济成为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灵魂是求同存异，是“和”而不是“争”，是要化解而不是激化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分歧。

其二，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反映了习近平敏锐的历史洞察力。重视历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也是习近平分析判断形势时特别强调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在哲学高度，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sup>①</sup> 习近平特别注重从历史规律高度把握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确定中国在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尤其强调要注意认识中国“历史交汇期”与“世界转型过渡期”的演变规律。习近平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部环境的机遇与挑战都在增加，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大。维护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世界形势变化趋势和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的基本特征，更好地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习近平指出，一方面，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在“历史交汇期”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世界形势在多层、多领域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世界力量分布与对比关系的变化。在这方面，基本趋势是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南北关系更趋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主宰一切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其次涉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式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各种矛盾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与或然性增多。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又一类动因，科技发展将深刻影响各国内部产业结构与世界分工体系，进而影响世界各国的内外发展环境。在上述变化背景下，各国内部和国际社会各种思潮的碰撞将进一步加剧，在世界上形成更加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外部环境的上述变化，对中国维护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利弊兼有，风险和挑战同时都在增加，如何应对考验中国的智慧。

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关键因素。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sup>①</sup>世界力量对比关系变化带来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态势关键在于中美两极，国际秩序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中美世纪博弈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道路之争、制度之争，既是东西问题，也是南北问题。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态势如何，中美能否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以及“冷战陷阱”，国际影响甚大，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自己的事，驾驭好中美关系，是妥善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与关键。

其三，基于两种制度可和平共存于一个世界体系的全球化新理念，以开放包容精神积极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

习近平外交思想时代精神的又一鲜明特色，体现在中国对于参与全球治

---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理体系建设与改革展现的开放、包容态度上。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盛行，美欧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风潮此起彼伏，经济全球化阻力增大，全球治理供需矛盾缺口拉大。全球化作为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进入换档期、转型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如何应对全球治理出现的种种挑战和问题，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全球化问题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又一次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洞察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①</sup>上述论述尽管没有正式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毫无疑问至今仍是对全球化基本特征的一种经典表述，因为19世纪的全球化在各民族相互往来、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方面所显现的基本特征在21世纪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科技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共存，而且注定要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长期和平共存。全球化虽然最初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变革改良，随着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和平共存成为历史趋势，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趋于弱化，全球公共需求属性趋于强化。

针对全球化在21世纪的新变化，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重点从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出发阐释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04页。

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sup>①</sup>

基于上述思想理念，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当代国际关系现实、既有国际感召力又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形成了一整套反映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中，中国通过多种合作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增加国际发展援助，建立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主办亚信上海合作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等，开辟了国际合作新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理念、新平台、新动力和新产品。<sup>②</sup>

#### 四、结论：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 中国外交哲学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哲

---

<sup>①</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sup>②</sup> 参见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 155—156 页。

学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所谓外交哲学，是指一个国家体现在外交领域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积淀，反映一个国家观察国际事务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与行为风范。外交哲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反映，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的鲜明价值取向、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在多方面反映出的鲜活时代精神，为中国外交哲学开辟了新境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能力建设。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哲学和精神层面对中国外交的升华，增强了中国外交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能力。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①</sup>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创新，而且在于其实践品格。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②</sup>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恰如 19 世纪“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sup>③</sup>，使人们在 21 世纪再次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极大增强了中国外交的四个自信；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与开放合作精神，激励中国外交在实践中时刻坚守人类道义制高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倡的斗争精神，提升中国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动性和应变能力，鼓舞中国外交不断通过开拓创新来驾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责任编辑：陈志瑞）

---

<sup>①</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 页。

<sup>②</sup>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2 页。

<sup>③</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